

温州社会变革见证录

中国温州

一本原生态记录温州三十年变革的书
一本由温州人自己讲述创业传奇的书
一本以鲜活的个案诠释温州精神的书

◎朱丹 谷迎春 著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
温州社会变革见证录

中国 温州 变革

◎ 朱丹谷迎春 著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式博弈：温州社会变革见证录 / 朱丹，谷迎春著.
杭州：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，2008，12
ISBN 978-7-81140-001-4

I. 中… II. ①朱…②谷… III. 社会发展—研究
—温州市 IV. D675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94548号

中国式博弈

——温州社会变革见证录
朱丹 谷迎春 著

责任编辑 鲍观明 任晓燕
责任校对 张振华
封面设计 刘韵
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(杭州市教工路149号 邮政编码310012)
(E-mail: zjgsupress@163.com)
(网址: <http://www.zjgsupress.com>)
电话: 0571-88823703, 88831806 (传真)

排版 杭州好友排版工作室
印刷 杭州半山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89mm×1194mm 1/32
印张 11

字数 300千

版印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81140-001-4
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-88804227

前 言

本书旨在为改革开放以来见证了温州社会变革的温州众生立言。

温州社会的演进,不单单是政府力量推动的结果,而是政府、社会、个人等多方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。基于此,课题组走访了温州社会政策决策者、政策执行者、政策研究者、政策受惠者和温州经济社会变革的先行者、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个利益层面的普通民众,聆听他们的经历和感受。出于尊重当事人的考虑,我们对访谈的对象均未署真名,但做到尽可能保留口语本身的粗砺性,不加粉饰地记录他们的声音,因此读者可以相信本书所有口述资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。

口述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研究方法,将研究者的主体位置与被研究者的客体位置置于双方互动的平台上,通过被采访者的回忆和感受来反映历史,使历史更为立体和生动。客观呈现口述材料,为读史者提供自主判断空间,能使口述历史更具开放性。因此口述史料包含的内容往往比文献史料更为全面。本书正是温州社会各界人士口述温州社会变革的真实记录。

课题组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下两点:一是以个案调查为主,搜集文献材料为辅。二是围绕个案强调深入、微观的调查研究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,在整理口述材料过程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,部分篇章完稿后未经访谈对象本人审阅,在此,恭请本书涉及的访谈对象谅解,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。

朱 丹 谷迎春

目 录

前 言	/ 1
-----	-----

辑一 政策回眸

他们说我是“个体书记”	/ 3
温州改革试验区重要政策出台的前前后后	/ 9
风风雨雨话温州——温州政策研究者如是说	/ 21
我与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风雨同舟	/ 32
十年求索,终修正果——温州股份合作经济的坎坷命运	/ 44
敢为天下先——开创“挂户经营”先河的金乡	/ 65
温州本土经济学家侃温州	/ 80
推倒户籍的“柏林墙”——温州户籍制度的变革	/ 84
从 3.87 到 21.5 ——温州住房制度的变迁	/ 92
摸着石头过河——温州劳动制度、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	/ 99

辑二 商界风云

为了生存与发展——一个逼出来的企业家	/117
财富·保障·生活——记早期创业的温州家庭	/124
光荣与梦想——温州私人办学第一人	/131
浮动利率的试行——金融体制的突破从这里起步	/145
一个企业家的创业历程——从交通实业到教育事业	/154

辑三 社会变迁

透视“城中村”——失地农民的小康日子	/167
现代与传统的胶着——异乡人看龙港	/178
即将消失的村庄——探访温州城市中的农民生活	/191
“找条出路破”——瑞安农村普通家庭的生活变迁	/197
不种田的农民——柳市周边某村的调查	/204
从庙宇到纪念馆——温州农民文化理念之变迁	/210

辑四 民间组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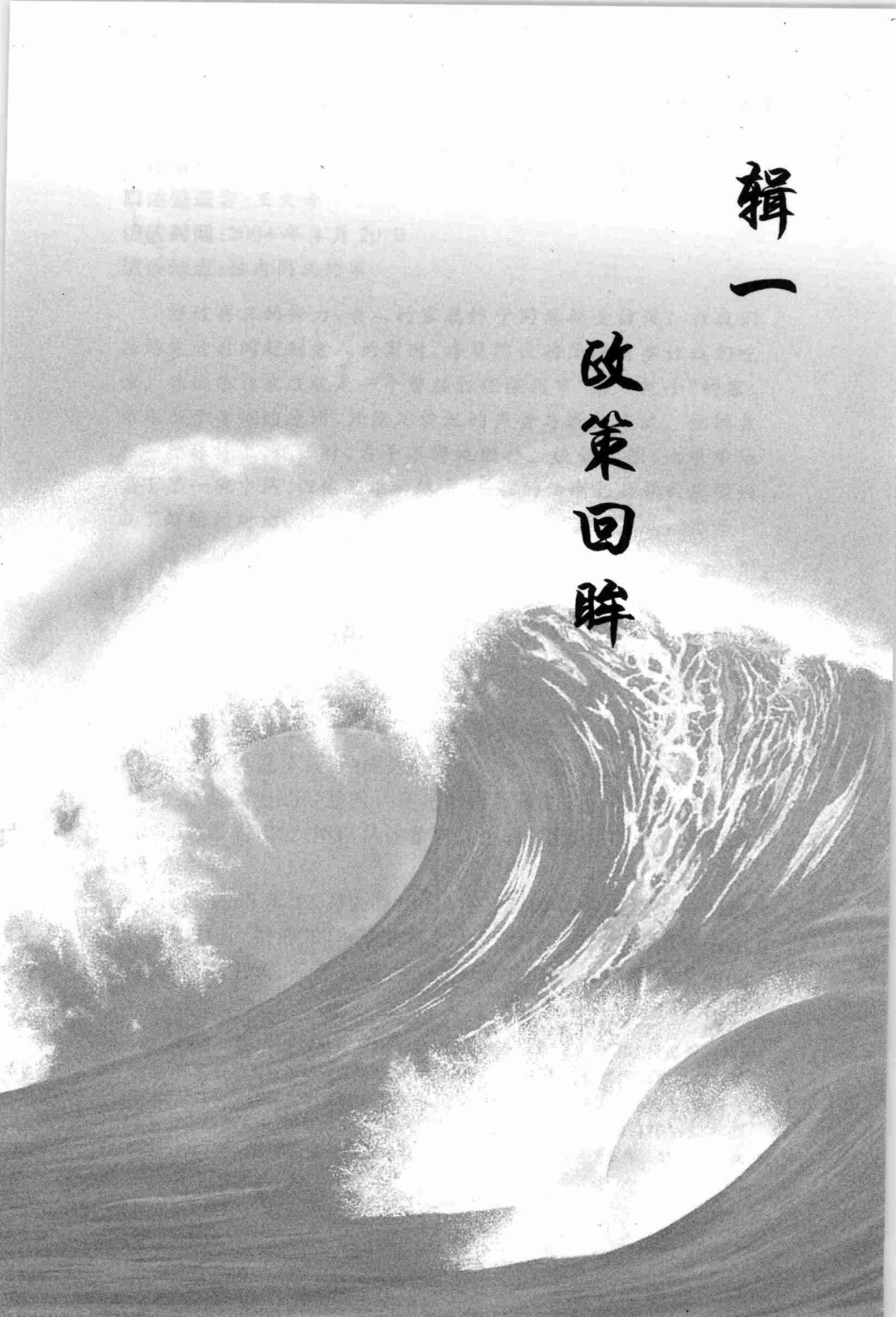
有作为,才会有地位——工会在温州民营企业	/227
舞动的音符——温州市行业商会之我见	/237
爱的奉献——温州的慈善事业	/253
花甲天使——记温州某社区居委会的工作	/262

辑五 社会众生

温州,太刺激了——一个银行职员的社会见闻	/273
七年之痒——高校教师看温州	/280
我不太像温州人——温州小百姓的生活	/287
温州的中产阶级——年轻公务员的生活状态	/293
低保户的家庭现状——住廉租房的人家	/298
城镇户口没戏了——农村青年的户口情结	/303
围城里的挣扎——农妇进城的酸甜苦辣	/313
我想在温州发展——一个外地人在温州的打工生涯	/323
后 记	/336

輯一

改革回眸



口述者:80年代中后期温州市委主要负责人 男

口述整理者:王文奇

访谈时间:2004年4月20日

访谈地点:该老同志的家

经过再三的努力,老人的家属终于同意接受访谈。当我们在约定的时间赶到老人的家时,房屋陈设的简陋有些让我们吃惊。你很难想象这就是一个曾经担任温州市“第一把手”的家。老人由于身体的原因,只能用低沉的声音与我们交流。他偎靠在一把藤椅上,说话时,右手不停地颤抖。谈话间隙,他艰难地喝下了一碗中药,但他思维的缜密,头脑的清晰与身体的孱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他们说我是“个体书记”

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。有些事情记不大清楚了,有些事情也不必再说了,已经成为历史了。历史自有公允,历史是客观的。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尊重的,我们全党、全民曾付出过高昂的代价,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,重新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十分重要。

我是1985年12月去温州的,当时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现象,诸如“包产到户”的争论非常之大。就在我去之前,市委书记还在抓资本主义,曾抓过著名的“八大王”。^①省委派到温州的

① 1982年初,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,以“投机倒把罪”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“风口浪尖”上的人。在个私经济发源地温州市乐清县柳市镇有八个有名的个体户,分别被称为螺丝大王、五金大王、目录大王、线圈大王、矿灯大王、供销大王、翻砂大王、旧货大王,他们在1982年到1983年间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。此事被称为“八大王”事件。1984年“八大王”被平反。

工作组接连不断。

我认为,我们搞社会主义首先要让老百姓相信你,让老百姓吃饱饭。那时我的想法是要搞好国有企业,我也是按这个初衷去实践的。我做的第一步就是调查研究,一切从实际出发。何去何从,让实践来说话;是好是坏,让实践来说话。

国有企业中我们调查了友谊工厂,汇总的意见是搞不好。因为它的产出少,投入也少,你叫它积累根本是一句空话。国有企业一般来说都不容易搞好,虽然它也是尽力的,但它的机制、体制决定了它的命运。我也调查了个体私营经济,它最大的生命力是投入小、产出大、积累多、良性循环。它的投入产出比例是这样:1元钱投入,有10元钱的赢利;而我们的国有大型企业,10元钱投入,只有1元钱赢利。反差这么大。

国有企业不改革,就必定萎缩,这是规律,不可阻挡的。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,争论很大,笑我是“个体书记”(笑了起来)——不是老百姓,是政界的人背后这么说的。

经过对温州十三个县的调查,我们最后形成了一个报告《国有、集体、股份经济、合作经济、个体经济“五个轮子”一起转》,报告中提出这样一个主张:在温州的主导经济不是国有、集体经济,而是个体私营经济。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:《在一定的历史时期,一定的领域,在某些生产环节,个私经济是主力军》,这篇文章发表在《世界经济导报》头版头条,还有《中国供销合作时报》,也是头版头条,时间记不清了。

我的一些想法都是从实践当中来的。我认为解放以后,我们在农村工作中曾出现过急躁冒进倾向的错误,最典型的就是“学大寨”^①，“小靳庄”^②我也去过。这些经验教训太深刻了，我

①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。20世纪60年代开始,全国农村兴起了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,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。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,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。

② 小靳庄是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,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的小靳庄,曾被塑造成“革命”的“样板”。

们应该吸取这些经验教训,从实际出发,真正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。

我们再从实际看,温州的经济是有生命的,这样的经济老百姓欢迎,国家也很欢迎。就在温州经济发展备受争议的时候,有些人提出温州是“偷漏税经济”,也就是说,温州富起来,是靠偷税漏税富起来的。我不否认温州有偷税漏税这种事情,但是当时我回答他们:我们温州国民收入 100 元钱,就有 7 元钱是税,这是全省都有名的。我请问,如果温州偷漏税多,那其他地方是不是就更多了?

其实呢,应该去研究的是如何对个私经济加强管理。当时中共浙江省委针对温州的情况,正式下文提出了六字方针——“教育、引导、管理”。“教育、引导”是要的,关键在于怎么理解“管理”。管理在强化了政府的职能的同时,还应该让市场经济畅通发展。我们今天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,就是培育了市场环境,如果没有培养市场,那市场经济无从发展。温州市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温州个私经济发展的文件,那是因为发展个私经济,需要一个保护环境,需要用旗帜鲜明的条款保护个私经济的发展。经济体制的改革、市场经济的发展,它一定要有一个大的环境,也要有一个小的环境,最好的环境是一方官员的头脑要冷静,要站得高看得远,要从长远利益出发。

经济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,经济发展有它内在的规律。我们国家的金融机制是国营的机制,个私经济一发展,直接冲击了我国金融既有的模式,所以温州率先实施了新的金融浮动利率,^①率先开设钱庄,^②这在温州是不奇怪的事情,但是当时这样搞的确有争论。对温州这些新的金融现象,老百姓们说“好得很”。

① 1987 年 9 月 21 日,《温州市利率改革试行方案》实施。温州市成为全国首个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。

② 1984 年 9 月 30 日,经温州市苍南县钱库镇政府批准,由方培林创办的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——方兴钱庄,在钱库镇横街 29 号他自家屋里开业。

由于国有银行对个私经济经营者的贷款有限制,这样个私经济经营者连着一两年吧,不跟银行打交道,他们向民间借贷,所以出现了民间金融倒台的教训。我到温州去工作第一个就是一批“抬会”倒台。^① 改革开放之后,银行还是实行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的政策是不行的。

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产权明晰。当时温州有的企业生存的周期很短,什么原因呢,就是产权不明晰。当时温州农村的企业,如协办企业,实际上都是个人投资的,集体没有什么投资。所以 1989 年以前,我们组织了三十多人的工作组搞产权明晰,如果不搞产权明晰化,即使搞经济体制改革,那都是假的,没有落实到实处。中央调查组来温州调查,最后肯定这么做是对的。

我认为自己对温州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搞股份经济。桥墩门啤酒厂我最熟悉了,现在那厂长已经去世了,我最早在那里作调查,啤酒厂的事也可以说是我导演的。^②

老百姓日子好了就好,我官大官小没有什么,死得早死得晚也没有什么,我想为老百姓办一点事,我想得很多。当时省里曾经要把改革试验区取消掉,我认为不能这么做,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央决定的,省里无权取消,试验区的领导是由中央和省委干部担任的,中央的领导中有杜润生^③,这是有文件的。^④

①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,温州乐清、苍南兴起了一种民间互助资金热,在当地称为“抬会”、“排会”,它以“高息”为条件吸引群众入会。但如果资金链断裂,“抬会”会发生集体性雪崩,一个案件就可能波及 10 多万人,并引发民间借贷的信用危机。

② 温州市南方啤酒有限公司的前身——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,是温州市第一家实行规范化的股份合作制企业,也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的诞生地。就是这家企业的《章程》成为 1990 年农业部颁发的《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》的蓝本。

③ 杜润生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、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,是中国农村问题专家。

④ 1987 年 9 月 16 日,国务院批准温州市为全国首批 13 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。

温州经济发展中,一些国有企业倒闭,工人下岗,我们当时的政策是一个人补偿1万元钱。当时1万元相当于现在10万元,工人们拿到钱都非常高兴。这1万元,企业能拿就企业拿,企业拿不出就政府拿。

那时包括学校医院里的征用土地费长期解决不了,后来基本上都处理好了。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了,养老金、土地收益金都要征地单位承担,学校、医院用农民工也是没办法,必须要用。农民工每人拿了1万元,他们满意了,单位也就不再给他们安排工作了,减轻了负担。农民工拿了钱做生意去,高兴得很。

市政建设我们那时开了个头,利用级差地租,改造了人民路。当时省里面跟我说停下“楼堂馆所”,我说我这个不是楼堂馆所,我没有搞楼堂馆所,我是改造人民路,而且是非政府投资的,是集资联建。我记得我们改造了28万平方米,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扩路,我是尝试一下,看看究竟怎么样,当时可以说走在全国前列。

社会保障简单地开了一个头,搞了一些试点,在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中搞社会统筹,这是在1987年、1988年、1989年,三年实验。我们当时就怕把这笔钱挪为他用,那就麻烦了,所以我们账户到个人。教育方面,我认为整个来讲,温州当时的教育是不错的,平心而论,某些县、某些乡村还是远远不够的。当时情况最清楚的还是宋文光^①,宋文光当时是试验区办公室的主任。

在温州几年,我没有在重大问题上犯错误。我的思想有点偏激,人们一下子接受不了。有人说,你这人太傻了,公开发言,暴露自己,这个不应该,要收敛一下。我态度很明确,错要错个明白,对要对得正大光明。

^① 20世纪80年代,宋文光负责温州试验区工作,时任温州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,组织起草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地方法规,曾编有总结温州改革试验区十年历程的专著《试验·突破·创新》。

访谈感想

他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温州的最高领导。那时候,温州的私营经济比例已经占工业的40%、商业的50%和交通运输业的80%,温州成了全国最著名的私营经济的大本营。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虽然与他息息相关,但在上任的第一天他却是带着一种极端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私营企业。“我是带着一大堆的问题到温州来的”,他说他在温州的几年,终于得出一个结论:要保护发展经济的排头兵,也就是保护私营企业。于是有了他在任时的许多“中国首创”:“个体挂户经营”、“私营企业”、“股份合作”,等等。

到底是支持还是打击“个体经济”?十八年前,这是这位温州市领导必须抉择的问题。今天,这早就不是问题,然而,十八年前,这是一个大问题。

让事实来说明一切——没有武断、没有成见,而是实地调查,制定真正符合民情的政策,保护民间经济的发展。老书记并没有过多描述自己当年承受的压力,但“个体书记”的称号——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并不轻松的称号啊!

温州的路走得并不平坦,偷漏税问题、金融“抬会”足以让人对温州刮目相看,更不要说新鲜的“股份合作制”、“产权明晰化”。在全国人民都承认温州所取得成就的今天,人们更多地发现,经济发展不是单维的,经济多元化必然推进整个社会的配套革新,温州在改造城市、社保统筹等方面通通走在了全国前列。

在访谈的过程中,我们忍不住问,您当年做事怎么这么大胆?他说:“自己有见解,无私所以无畏,做事情不拖后腿。”我想说,“尊敬”是我们那一刻最强烈的情感。

在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,我们却没有机会赠送给他了,因为这位令我们尊敬的老人已经离世。我们相信,温州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!

口述者：前温州改革试验区领导 男

口述整理者：王文奇

访谈时间：2004年7月28日上午

访谈地点：温州饭店

第一次约他见面，他说“因为时间太久了，我要回忆回忆，因为说出来的话是要对历史负责的”，后面又约了他三次都被婉谢了，最后由于我们的坚持，他终于接受了我们的访谈，在一个非常炎热的夏日里，老人亲自跑到我们所住的宾馆，给我们讲述了十八年前温州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历程。

温州改革试验区重要政策出台的前前后后

我是在温州出生的。1980年到金华工作，1986年回到温州。回来的原因有两条：第一，我是温州人，想为温州做点事；第二，董朝才^①原来在金华地委工作，他到温州一年多了，他希望我也过去。两者结合，1986年我就回来了。那时“温州模式”^②在全国已经炒得很热，全国都在关注温州。我当时任温州市委副秘书长，负责改革政策研究这一块，这样我就参与了温州整个改革决策制定的过程。

1986年也是全国试验区开始筹建的时期，1986年省委已经报给中央温州要搞改革试验，市委要我分管改革政策研究这一

① 董朝才，1985年12月任温州市委书记，1990年2月调离温州，到省体改委工作，1998年离休，现已去世。

② 1985年5月12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头条刊登《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》的报道，“温州模式”首次见诸报端。“温州模式”是温州人民率先运用市场机制，发展民营经济，实现富民强市的经济发展模式。

块。1987年以后,中央5号文件同意温州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,温州是第一批国家改革试验区。温州试验区不是单项的试验,而是综合的,建立综合性城市,但是重点是乡镇企业制度,包括个体私营经济。我当时就是试验区改革小组的成员,省里也有试验区领导小组,组长是当时的省委秘书长马尔康,还有李云河^①等五人。温州市委也要组织领导小组,组长就是市委副书记。我是专职的副组长,下面有几个人,包括市委办公室的、财政局的、银行的等,还有郑达炯^②都是成员。后来呢,我专门研究农村改革试验这一块。1988年以后,我又兼任市体改委主任、研究中心主任、副秘书长、试验区小组组长四个职务,经历了1986年到1996年温州农村改革试验的十年。

温州成为全国农村经济改革试验区,它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政策问题是这样的:

温州初期发展是自发的。放开搞活之后,农村的“包产到户”、承包制使农民获得了种田经营自主权,农村生产力大量被解放出来,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到哪里去、干什么的问题。在当时的情况下,温州人要有饭吃,就要自谋出路。温州农村有很多小商品企业,这些企业有个特点,投资的成本不是很大,技术比较简单,依靠手工劳动,所用资源都是废旧资源,用的能源少,产品灵活多样,家中的劳动力都可以充分利用起来,成本低,收益大。产品的价格也不是国家定价,像绳子、纽扣,都是国家计划外的。另外一个特点是小商品容易普及,一家一户,你可以干,我也可以干,家家户户都可以干,所以出现一个产品一

① 李云河是中国第一个进行“包产到户”试点的人。1956年,担任浙江省永嘉县委副书记。年仅二十六岁的李云河,首先在水嘉县三溪区燎原合作社进行“包产到户”试点,并写出了中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述“包产到户”的文章——《燎原社包产到户经验总结》,成为中国第一个进行“包产到户”试点的人。

② 郑达炯在20世纪80年代曾任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,长期致力于“温州模式”研究,为温州本土著名经济学家。